

思想政治工作视角下的农民精神困境及对策

刘学坤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中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民精神生活中的积极角色正在弱化,农民面临着精神困扰,具体原因是农村新精英空场,农村道德互动出现危机,农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农民公共生活意识的弱化。这一困境的超越需要培育农村新精英,革新农村政治文化,促进农民群体现代政治心理发育,维护和重建公共空间。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现代性;农村新精英;农村道德;农村公共生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19-04

现代性作为世界偶像正把人类带入精神困窘中,农村也不例外。中国农村^①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民精神生活中的积极角色正在弱化,农村面临缺少道德、文化等精神权威的局面。农村宣传工作曾以“活生生”的效果和很高的实效性,适应了农民的现实状况,为农村提供精神支持,并成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伟大经验总结的重要部分。而在今天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专业队伍逐步淡出,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农民的教育作用有待提高,而学界对农民的精神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诸问题的关注还显得很不足。

一、农民的精神困境

1. 农村新精英空场

现代精英的荣誉被授予了现代化的推动者,农村现代性发育的迟缓使其没有生长出现代化的精英文化,农村出现了新精英空场。城市精英群体的大部分是在不同时期由农村移入城市的,城市被现代化界定为精英的社会空间,于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持续伴随着新精英的逸出,这是农村建设史上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传统精英在农村的道德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明清时期由底层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农村乡绅,到新中国成立

前的农村识字人、乡村干部,农村一直是由一批精英发挥着文化传递、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们是农村教化生活的领袖,在教育和各种仪式等农村公共性的日常生活中担当着核心人物的角色,为了稳固自己的精神影响力,他们还会通过救济等物质慈善的方式来干预农村的社会生活。

农村基层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虚弱使农村社会缺少培育和使用精英的土壤。农村的经济建设使传统文化精英地位降低,农村文化精英的转型使农村出现了精英空缺,农村出现的新精英又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逸出使农村的日常生活的参与者成为一个残缺的人群,这一人群已经被悄悄地符号化,即他们是出不去的人,因年龄等原因而社会生活能力差,被城市拒绝的人,他们的文化是一种弱者的文化,这与精英文化的产生是相悖的。这种弱者的文化倾向于躲避政治,对公共生活的保持沉默。

村落中的精英一直是农村社会资本的核心部分,在现代民主政治模式中,没有基于魅力等影响力的社会生活精英,会使社区中缺少积极的政治氛围,农村正处于这一境况中,其结果会带来村民的思想个体内化与社会教化期待的分离。宗教信仰在农村的快速兴盛正是农村这种依靠权威影响塑造公共生活的状况的反映^[1]。调查证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大幅上升,且“信教群体

收稿日期:2012-09-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10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10099);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资助项目(CXZZ11_0421)

作者简介:刘学坤(1981—),男,河南社旗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农村教育研究。

①本文对农村的着眼和思考对象主要着眼于最具有中国农村代表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化、市场化发育程度比较高的东部地区情况会有所不同。

主要集中在农村”^[2]。基于习俗力量的权威影响的逐渐退隐,急需一种新的形象化的,能依人格和能力负载起政治价值进而进行社会传递与塑造的精英。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权威在社会教化的运行机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3]。农村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精英,然而农村却没有形成与时俱进的精英文化。

2. 农村道德互动出现危机

农村人口的另一部分是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老年人拥有完整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集体记忆,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延续着新中国初创时代的教化成果。由于缺少青壮年文化等原因,农村的人际关系以一种残缺的形式存在。农村集体记忆的断裂是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型的契机,但它也使农村的思想工作出现了虚弱倾向。活跃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舞台上的是逐渐失去作为城市产业工人资格的正步入老年群体的群众,他们多数有“土改”、“文革”等改革开放前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酸甜苦辣的记忆。在他们的意识中,思想政治工作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事情,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新中国建设之初所必须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这一系列社会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对党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对今天借助于传统方式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担忧和怀疑,所以今日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思想等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如果仍旧沿袭这些传统形式,在这一农村社会群体就可能遇到一定程度的负面社会心理反应,而且这一过程还部分消解了常住农村的这一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需求。

在社会建制上,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大多是由这一群体的农民担任,他们有共同的心理戒备,不愿唤起内心的那一段历史记忆,年龄更大的老年群体,逐渐走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视野。农村的青壮年由于经常性地流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对于信息时代的网络、手机等时代标志性传播方式接触较多,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被他们拒斥,同时由于日常的工厂化生活使他们产生了要摆脱农村生活的意识,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兴趣不高,农村思想工作在面对不同群体的时候,形式上开始出现危机。同时在内容上由于农村成年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活特殊性,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出现疏离。“教育对象无法确定意识到内在教育需求,却又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启发”^[4]。在人口大量逸出的农村,村庄秩序的获得重新依靠简单的互助等传统习俗,这挤占了政治文化融入村民生活的机会。农村集体的空洞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实践使农村产生了强大的个人主义的生产力量。

流动性增强是农村现代性发育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农村看似户籍人口较为稳定,但是流动性极强,多元化的社会流动使农民互助这种道德方式出现了危机,日常生活中“低头不见抬头见”而带来的利他行为的反馈机制出现断裂,通俗地讲就是准备给予帮助的一方无法预计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一最该出现的受助者能否出现在村里,社会流动腐蚀着农村的互助友爱等道德链条。农村的这种道德生态问题的出现使许多村落熟人社会的道德优势退场,农村面临成为道德焦虑蔓延的城市般的陌生人社会的风险。农村的这道德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不断由发育中的农村劳动力等市场形式,农村的居住形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向城市学习等来试图弥补。不过这种状况也为农村进行法制教育,走向现代法治文明提供了机会。

3. 城市想象对农村的精神压抑

一直坚守儒家精神的农民价值观^[5],在整个20世纪无疑受到了巨大冲击。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忽略了农村,其昙花一现的历史表现没有给农村带来多少价值观的变革。农民价值观的真正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启的。视农村为重要阵地的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农民价值观上实行了持续的革命,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农村的系列革命,不仅带来农民的与现实相适应的价值观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农民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与梦想的视野,牢固地依赖党和政府的农民精神生活信仰在新中国开创过程以及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稳固守护着农民的精神家园和农村的社会心理稳定。改革开放是以城市作为前沿阵地的宏大规划,农村虽然也经历了巨大政策变革实践,但是在实质上农村成了后方,社会的巨大变革赋予城市以新的梦想,这一梦想没有否定过去的憧憬,但是严重地冲击了群众的精神信仰。农村在对城市的翘首以盼中动摇了昔日的信仰,农村在现代化规划中在思想建设上被忽略了。集体主义对经济以及信仰领域的诸多出让使农民生活对集体进行了大撤退,其中一部分退回了家庭等价值观领域。

现代化的布局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农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布设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过几个高潮,其中一次是建国后在农业合作化阶段,农业合作化涉及农村利益关系的调整,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利益共同体确立起农民的集体身份,组织、利益和思想在农村被统一起来。合作社的解体使农村的经济生产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发生了巨大变革,

农民的利益重新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农村利益格局中“私性”的回归使以“公”为主要导向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村开始低落。社会转型中的经济因素实现了对农村秩序的重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使他们之间曾因经济关系而加强的社会关联度下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中以城市为依托的大工业相对于农村经济的绝对强势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使农村成为一个人口持续地被城市吸纳进而集体生活陷入沉寂的地方。它带来了农村社会关联的公共性的降低,对城市的精神与行动上的向往使农村在这一结构中成为城市经济与文化的末梢,农村之自我性迷失。处于现代化一个个节点的农村急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之一的城市化是与农村的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农民群体的思想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关于大学生等其它非农村常驻人口的土地分配和回收等问题也经常引起思想上的矛盾。土地是农村和农民利益的主要载体,农村人口的流动性的增加直接引起农村以人头为标准的土地分配的不断进行,于是现代农村部分地区围绕土地的思想问题和现实矛盾一直存在。现阶段农村政策处于变化较大时期,大量的针对农村和农民的普惠性政策应该借助于思想政治工作渠道转化为农村的积极的政治资源。

4. 农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农民公共生活意识的弱化

农村在一种朴素的意识即集体主义的寄托下开展公共生活,满足公共需求,以公共财产、集体利益等为载体,集体主义担当起农村公共空间的塑造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等公共善意既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农民的现代公共意识被集体主义取代。现代性对集体德性的冲击使集体主义这一公共意识的生机遭到侵害,舍己、奉献等美德支撑的道德社员或村民出现了信仰危机,进而带来了农村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的日趋减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层民主在很多农村地区陷入空缺或形式化。村民大会等在社会转型的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用形式取代了实质,在农村的伦理教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公共生活也逐渐减少,而这曾一直是农村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农村的集体活动在今天很微弱,昔日以公共义务等形式存在的农闲季节的义务“出工”也已经退出农村生活,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水利工程等为重点的集体劳动活动今天已经退出,在劳动场所交流党的农村政

策和纵论国事家事的体验消失,坚守农村的青壮年在农闲季节忙于创收或娱乐。政治没有冷落农村,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村的弱化使农村冷落了政治,缺乏参与政治的动力和氛围,农村逐渐形成了对国家优惠政策的习惯性期待,缺乏政治关怀热情。村干部与村民的因公交往中的政策宣传和解释成为农村不多的宣传教育渠道。

其次,集市的衰落。集市本来是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媒介,集市培育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启蒙着农民的市民意识,集市也是农村发育出城市气质的重要通道。集市是农村重要的公共生活场所,费孝通曾指出集市在农村集体化生活中有重要的作用。集市不依赖于集体,但是集市是集体市场意识、现代公平意识等现代工业化时代所必须的精神的重要发源地。集市的衰落是近现代农村的重要的事件。

再次,墙壁宣传的退隐。墙壁具有召集功能,墙壁宣传以其便利和直观,能将政治教育内容毫不费力地映入群众眼中,导入心中,而具有天然优势。墙壁在新中国事业开创的过程中一直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解放前结合不同时期革命的任务,在墙壁上粘贴革命与抗战思想材料,或直接在墙壁上刷上进步的革命思想,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的场景曾经是党在革命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法宝。建国之后在和平的形势下,在墙壁上书写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其它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也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比如工厂、学校、军队的内外墙上的标语是几代人的政治记忆。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渠道,在当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十分重要。在一些近乎废弃的农村小学墙壁上仍然隐约可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四有新人”之类的宣传内容。在一些年久失修的农村老房屋墙壁上,斑驳的白灰字记载着党和国家昔日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形式。

所以尽管现代城市美学排斥这一形式,其另外一种替代形式却仍被部分保留,即宣传条幅和电子屏,这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眼球进而进入大脑的方式保留了对墙壁宣传的记忆和再现。然而与墙壁相比条幅和电子屏在便利的同时却摆脱不了“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缺陷。墙壁宣传以其长远性,以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长久地留在人的脑海中,在时代的变迁中让群众具有时代变革的历史感。以笔者的体会为例直至今日回到故乡在那小村子仍可看见村落多处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等昔日政治宣传的口号,而且这些宣传不仅在我这一代及比我年轻的一代脑海中,在年长的乡亲们的记忆中它

们更具有历史感和亲切感。这一面面墙壁不时唤起他们的政治记忆和对过去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记忆。每每闲聊起那几面墙壁,乡亲们总是极富感情地忆起往事来,这些集体记忆近日仍然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

今天的城市美学取向排斥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借助于在墙壁上书写政治与价值观等内容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已经从城市退却。农村墙壁“宣传”充斥的是“商业信息”,墙壁充当了各种合法与非法市场信息传播的工具。墙壁内部是私密的空间,但墙壁外具有公共性,今天对外墙美的追求过程中忽略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墙壁可以直观地连接起公和私,唤起对私的超越之情。农村墙壁的去政治化、市场化是农村现代性现状的一个缩影,现代性并不排斥政治,而农村政治和思想政治工作则出现了现代性的空场。

二、对 策

1. 培育农村新精英

农村青年经过教育等途径进入城市,成长为社会精英,他们的精英身份深刻嵌入城市结构之中,教育途径培育的精英具有鲜明的城市气质,以适应城市和工业文明为重要追求,所以教育较少培育出具有扎根农村热情的农村精英,反而间接剥夺着农村留用精英的权利,农村已无法成为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等精英“上山下乡”的价值实现场所,农村对于青年实现价值的困境现状很多方面不是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问题,而是农村在社会价值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弱势造成的。教育的社会价值追求对农村的发展重视不够,存在道德缺陷,“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理应包括农村社会,教育和教育管理部门需要伦理反思。

大学生村官工程是对农村的精英反哺,这一工程虽由政府主导,但处于国家行政体系之外的农村自治的政治格局使得这一工程更多是加速农村社会从经济上致富迈向现代化的策略。大学生村官带领农民致富的目标设定,是政治力量以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整合农村社会的新尝试,它是从政治层面对农村精英的重新界定,在几年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重塑农村的新精英文化,不仅是农村经济建设的制度性需要也是农村精神与价值生态健康平衡的重要条件。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寄希望于农村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性力量的成熟和强大,培育以新精英为主体的农村事业永不走的工作队是农村人才建设的主题。

2. 促进农民群体现代政治心理发育

农村的政治文化强烈地依赖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的世界观、价值观应是新时代农民的精神追求。在现实中,许多农民仍然把对它们的接受建立在对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与心理对接的基础上,对农民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启蒙和教育还没有彻底完成。利益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关注焦点之一,从新中国创建开始,党就重视给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巩固同农民的血肉联系,正如江泽民所讲,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的发展和维持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靠对农民的坚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服务工作,还靠加强对农民的教育”^[6]。这一优良传统和执政立党的美德一直保持到今天。

近些年,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更显示出党善于处理同农民关系的执政能力。然而光靠这个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忽视对农民的教育工作。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紧密结合农民的利益而开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执政工作仍要高度重视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农民对利益的真切感受中,塑造农村的政治文化和农民群体的政治心理。

3. 维护和重建公共空间

人有交往的天然需要,人还可以被引入公共空间而产生自发性交往。集体的思想教育功能最重要的在于它建构了一个实质性的公共空间,它借助生产等活动把人组织起来,形成公共交往的社会机制,不断激发和延续人的公共需求。农村集体意识的弱化与集体的空洞是农村现代性追求的结果,如何重建集体和农村公共空间是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农民新的需求正在新的经济和物质条件下被激发,比如农民的阅读和欣赏艺术等需要,所以农村的公共空间的建设有许多方式,可以是永久性的公共空间营造社会空间,比如农家书屋、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文化大院等。也可以是流动性、活动形式多样的,比如送科技下乡等。这种形式迅速地把农民组织起来,把科学文化的启蒙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墙壁宣传这一宣传教育的形式正在农村部分地区悄然复兴,“村镇文化墙”、“文化室”等正在复制墙壁这一传统的宣传教育渠道。通过活动建构起公共空间的同时建构的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

时代的变迁使农村出现了新形式的群众矛盾,农村建立农民矛盾调解机制,及时化解农村矛盾,也是以活动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渠道。针对法国农民,马克思曾经这样说“他们的(下转第53页)

道诉求方式的存在给予正式渠道的完善提供了参考和深思。但是,一些非正式渠道往往会触碰到“违规”和“不合法”的边界。折晓叶也提出,非正式渠道往往被冠以“农民的劣根性”,被认为“上不得台面”,如同詹姆斯·斯科特所描述的农民的“日常反抗”那样,难以进入被书写的变革史。^[14]因此,在对非正式渠道进行规范的基础上,建立更加有效的利益表达制度,完善利益诉求机制,保证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才能使每个公民都能充分地表达想法和建议,从而保证社会更加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 [1] 王梦奎. 关于“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的若干问题:在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讲话(2005年1月18日)[N]. 中国经济时报,2005-02-07.
- [2] 杨涛,施国庆. 社会公正视角下的失地农民[J]. 农业经济,2006(10):44-45.
- [3] 张传华,邓凌. 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心理特点探悉[J]. 农村经济,2005(9):116-118.
- [4] 高勇.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 经济学家,2004(1):47-51.
- [5] 丁利国. 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上接第22页)

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7]。这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农民状况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农民充分交往,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在生产生活中实现身心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 [1] 苏明.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1):39-42.
- [2] 阮荣平,郑凤田,刘力. 宗教信仰、宗教参与与主观福利:

初探[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10):194-196.

- [6] 黄泰岩,张培丽. 改变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发展一元化[J]. 前线,2004(5):26-28.
- [7] 许峰. 农民市民化问题探讨[J]. 绿色中国,2004(20):52-53.
- [8] 于浩森,陈绍军. 失地农民的心理场及其重构:基于“仙居雅苑”安置社区的个案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1-46.
- [9] 张海波,童星.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 社会科学研究,2006(1):128-134.
- [10] 应星.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J]. 社会学研究,2009(6):105-121.
- [11] 彼特·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孙非,张黎勤,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10.
- [12] 胡伟. 政府过程[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00.
- [13] 胡建. 冲突与缓和:市民社会语境中市民和国家: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立法为维度[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60-63.
- [14] 折晓叶.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J]. 社会学研究,2008(3):1-28.

信教会幸福吗?[J]. 中国农村观察,2011(2):74-86.

- [3] 戴锐. 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变迁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重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6-9.
- [4] 王树荫. 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91.
- [5] 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 陶鹤山,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5.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1.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7.